

民大中文研究书系

中唐

文论研究

陈允锋 著

NGTANG
LUN
YANJIU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民大中文研究书系

中唐

文论研究

陈允锋 著

ZHONGTANG
WENLUN
YANJIU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唐文论研究/陈允锋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6
ISBN 978-7-5004-8761-6

I. ①中… II. ①陈… III. ①文学理论—文学评论—中国—唐代
IV. ①I206.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90604 号

责任编辑 胡 靖
责任校对 修广平
封面设计 杨 蕾
技术编辑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君旺印刷厂

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7 插 页 2

字 数 296 千字

定 价 3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贾晋华

陈允锋教授的新著《中唐文论研究》即将出版，嘱我为序。对此我是推辞了一番的，不是客气，而是确实觉得不够“资格”。允锋于1981年进厦门大学中文系攻读学士学位，而我则于1982年硕士毕业留校任教，故有机会教过他们班一两门课，由此忝备“师位”。然而，允锋在读本科时固然一直是令老师们赞不绝口的优秀学生，但他能够在传统文学理论的学术研究方面打下牢固根基并发展腾飞，主要是由于在硕士和博士学习阶段师从众多名师，包括张少康教授、陈熙中教授、王达津教授等。在这些名师之后，我实在无从置喙。此外，我虽然在研究中多少曾经涉及一点文论的边缘，但却从未真正深入这一领域。在中国传统文学、文化的研究中，文论是最困难的研究领域之一。我一般是知难而退，需要时就采用别人的研究成果。现在既然推辞不掉，我就只能从“使用者”（而不是专家）的角度，略尽“序”的推荐介绍责任。

尽管唐代是中国文学发展的黄金时代，传世唐代文论资料相对来说数量却较少。在中国传统文论的发展过程中，唐代文论似乎也不如前后时期突出。但有关此时期文论的研究，却相当“拥挤”，一直有众多优秀成果在涌现。因此可以想象，在这样的背景下，要拿出真正有创见的新成绩，是有很大难度的。允锋知难而进，制定了全面研究唐代文论的计划，并踏踏实实地、一点一滴地钻研积累。在2000年，他出版《唐诗美学意味：初盛唐诗学思想研究》（北京：新华出版社），是他多年勤奋耕耘的结晶，问世后获得学界好评。十年之后，他又完成第二阶段的

研究，推出中唐文论的新成果。

此部新著分为五章，分别以中唐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皎然、韩愈、白居易、柳宗元、刘禹锡等五家文艺理论思想为研究对象，涉及诗道、意境、创作心态、创作才能、文艺鉴赏等众多重要理论问题。书中以标准的学术规范为出发点，一方面细心搜集原始材料，在已经被人爬梳过无数遍的唐代文献中，找出许多尚未被人注意的新文论资料；另一方面全面了解研究背景，充分掌握学术现状。正是在此厚实的基础上，允锋能够突破现有的研究，发现和论述许多新的学术问题，并对一些虽然已经有较多研究而尚欠深透的学术问题展开新的讨论。

全书分析精细，新见迭出。例如，关于皎然诗学思想的研究，以往多集中于其意境理论的分析，允锋则注意到其被忽略的诗史观、诗道观、高逸观等。由于我曾撰写《皎然年谱》，对皎然诗论有一定了解，深知允锋拈出皎然包括诗道论在内的诗史观来讨论，确实是眼光敏锐。关于韩愈的文艺思想，允锋从其与庄学关系的新角度切入，谈“不平则鸣”说与庄学“自然”观的联系，从韩诗的诙俳戏谑特点看《庄子》“正言若反”立言精神的影响，论韩愈“为文精专”说与庄子“凝神”“巧专”观的同异，述其从“天人相仇”的角度说明怨天情绪产生的现实根源等，这些皆是非常富有启发意义的新见解。允锋对白居易的诗乐合一观及其对文艺才能的看法也做出独到的探讨，并对学界谈论较多的尚俗诗学观从新角度加以讨论。对于柳宗元，允锋则提出奇味说、比兴观及文章鉴赏观等新问题来展开讨论。允锋关于刘禹锡的中道观及其地理意识与诗学思想关系的研究，尤其能见出其新异深刻之处。允锋认为，中道观念有助于刘禹锡以辩证的思维方式论述文艺理论问题；讲求“时中”与“权变”相结合的中道思想，促成刘禹锡崇尚通变的文艺思想的形成；刘禹锡注重文艺社会功用的观念，跟强调“用中于民”的中道思想也有非常密切之关系；而刘禹锡对地理历史沿革、地域民风及地方歌谣的充分重视，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他的文学创作及其诗学思想特点的形成。

全书从具体问题入手，以规律概括为学术宗旨，点面结合，创作实践与审美意识并重，展示了中唐文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描述了唐代文学思想发展过程中一些重要观念的嬗变轨迹。书中主要体现了三方面的

学术创新和价值：发掘出一些被一般研究者所忽略的文论材料，拓展了中唐文论的研究空间；深入地探讨了中唐文艺思想的理论渊源，在细致分析相关资料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看法，弥补中唐文论研究之薄弱环节；并关注中唐文学思想与其他艺术理论的关系，拓展了中唐文论研究的取材范围，揭示了中唐各文艺门类之观念的内在联系。允锋此书无疑为传统文论的研究作出了独创的贡献，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学问如其人。允锋为人厚实，做学问也同样厚实，没有惊人的产量，但却一步一个脚印，讲自己的创见，写自己的发现，为学界作出厚实的贡献。孔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为己者以学术为生命，安安静静做事，走自己的路，不争名利，不计得失。为人者热衷于校园政治、广告学术，华而不实，哗众取宠。允锋是为己的学者，这仅从他在唐代文论研究方面制定的长期规划（且不谈他在其他方面如《文心雕龙》研究等的成就），并踏实、勤奋、严谨地逐步实现就可看出。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他的初盛唐和中唐的优秀成果，自然可以翘首期待他的晚唐研究以时推出。

庚寅年新正撰于莲岛聚石斋

目 录

序.....	贾晋华(1)
第一章 皎然诗学思想研究.....	(1)
第一节 皎然之诗史观.....	(1)
第二节 皎然之诗道观	(10)
第三节 皎然之高逸观	(32)
第四节 皎然之“作用”说	(47)
第五节 皎然《读张曲江集》义证	(53)
第二章 韩愈文艺思想研究	(72)
第一节 韩愈文艺思想与庄学精神的关系	(72)
第二节 韩愈天命观的文学意义及其对诗学思想的影响	(83)
第三节 韩愈诗学理想与书法审美观念之关系	(97)
第三章 白居易诗学思想研究.....	(116)
第一节 诗乐合一观与白居易的讽喻诗创作.....	(116)
第二节 白居易尚俗诗学观的再探讨.....	(129)
第三节 白居易诗学思想与刘知几《史通》之关系.....	(139)
第四节 白居易对文艺创作才能的认识.....	(150)
第五节 白居易与韩愈诗学思想的共同性.....	(166)

第四章 柳宗元文学思想研究	(180)
第一节 柳宗元的“奇味”说及其形成原因.....	(180)
第二节 柳宗元的比兴观及其对散文创作的影响.....	(197)
第三节 柳宗元的文章鉴赏观.....	(210)
第五章 刘禹锡诗学思想研究	(222)
第一节 刘禹锡的诗道观.....	(222)
第二节 刘禹锡的中道观及其对文艺思想的影响.....	(236)
第三节 刘禹锡的地理意识及其诗学思想特点.....	(248)
后记	(262)

第一章

皎然诗学思想研究

第一节 皎然之诗史观

关于皎然诗学思想的研究，论者多注目于其意境理论。这确实切中了皎然诗学的核心问题，有助于充分地说明皎然在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的主要贡献。不过，皎然诗学思想研究也存在一些未引起足够重视或一直被忽略的重要问题。比如，皎然的诗史观，就是其中之一。本节试图从三个方面予以归纳、讨论，从中不仅可以看出皎然诗学思想与前代论家的继承性，也可以看出其诗史观的独特之处。这对于我们加深理解皎然之诗学，或不无裨益。

一 关于五言体诗的历史渊源问题

皎然《诗议·论文意》中说：“夫诗有三四五六七言之别，今可略而叙之。三言始于《虞典》、《元首》之歌，四言本出《国风》，流于夏世，传至韦孟，其文始具。六言散在《骚》、《雅》，七言萌于汉。五言之作，《召南·行露》已有滥觞，汉武帝时，屡见全什，非本李少卿也。”^① 这是从诗歌体裁的层面，略论各种诗体的源头，而尤致意于四言体和五言体的流变。这种论述方法，跟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有

^① 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汇考》，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02—203页。

相近之处。在《明诗》篇中，刘勰也是详于四言、五言之源流，而略叙三言体、六言体、杂言体、离合体等诗体，以为“巨细或殊，情理同致，总归诗囿，故不繁云”^①。

从诗体的角度论诗歌发展历史，皎然与刘勰还有一点更重要的共同处，那就是重点论述五言体的演变轨迹。《文心雕龙·明诗》篇自“至成帝品录，三百余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以下，考证五言之缘起，推论文人五言古诗之创作年代，然后品评建安、正始、西晋、东晋乃至刘宋诗坛，重点都在五言体创作。皎然也如此，他在讲完三言体、四言体后，直接讲六言体、七言体，而将五言体单独提出，细加讨论：

五言之作，《召南·行露》已有滥觞，汉武帝时，屡见全什，非本李少卿也。少卿以伤别为宗，文体未备，意悲词切，若偶中音响，《十九首》之流也。古诗以讽兴为宗，直而不俗，丽而不巧，格高而词温，语近而意远，情浮于语，偶象则发，不以力制，故皆合于语，而生自然。建安三祖、七子，五言始盛，风裁爽朗，莫之与京。然终伤用气使才，违于天真，虽忌松容，而露造迹。正始中，何晏、嵇、阮之俦也，嵇兴高逸，阮旨闲旷，亦难为等夷。论其代，则渐浮侈矣。晋世尤尚绮靡。古人云：“采缵于正始，力柔于建安。”宋初文格，与晋相沿，更颠顛矣。^②

按：皎然说五言诗滥觞于《诗经·召南·行露》，沿用的是刘勰的观点。《文心雕龙·明诗》篇追溯五言诗之渊源，谓“召南行露，始肇半章”^③；《章句》篇亦谓：“五言见于周代，行露之章是也。”^④这种看法，与钟嵘的认识有差别，《诗品·序》曰：“夏歌曰：‘郁陶乎予心。’楚谣曰：‘名余曰正则。’虽诗体未全，然是五言之滥觞也。”^⑤并没有

①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8页。

② 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汇考》，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03页。

③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6页。

④ 同上书，第571页。

⑤ 吕德申：《钟嵘诗品校释》，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7页。

提及《诗经·行露》。

至于汉代五言诗是否自李陵始，皎然似乎又斟酌于刘勰、钟嵘之间。《文心雕龙·明诗》篇说李陵、班婕妤之五言诗“见疑于后代”，对李陵是否曾作五言诗问题，持慎重的存疑态度，没有把李陵看成汉代五言诗的首创者；皎然明确提出，汉代五言“非本李少卿”，这跟刘勰是有相似之处的。但是，皎然的观点也游移不定，《诗式》“李少卿并古诗十九首”条又说：“其五言，周时已见滥觞，及乎成篇，则始于李陵、苏武。”^①这又跟钟嵘《诗品序》说李陵“始著五言之目”^②说相一致了。对于李陵之作五言诗及其诗风特点，皎然与钟嵘也有一致处。皎然指出，李陵诗“以伤别为宗”、“意悲词切”，钟嵘《诗品》“汉都尉李陵诗”条早已提出这样的看法：“其源出于《楚辞》。文多凄怨者之流。”^③至于说李陵五言诗还不成熟，“文体未备”，用语依然袭自钟嵘“诗体未全”，而颜延之《庭诰》谓：“逮李陵众作，总杂不类；元是假托，非尽陵制。至其善写，有足悲者。”^④或许对皎然也有一定的影响。

二 关于五言体诗繁荣发展阶段及其弊端问题

建安时期是五言诗发展的繁荣阶段，古今论家似无异辞。最早认识到这一点的，当是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曰：“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⑤钟嵘《诗品·序》称：“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⑥皎然的看法，亦复如是，故曰：“建安三祖、七

① 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汇考》，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28页。

② 吕德申：《钟嵘诗品校释》，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7页。

③ 同上书，第66页。

④ 郁沅、张明高编选：《魏晋南北朝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73页。

⑤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6页。

⑥ 吕德申：《钟嵘诗品校释》，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7页。

子，五言始盛，风裁爽朗，莫之与京。”^①

皎然对于正始年间诗歌创作的评论，是值得我们格外注意的。他一方面继承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的说法，同时又参考了《文心雕龙·体性》篇的评语“嗣宗倜傥，故响逸而调远；叔夜隽侠，故兴高而采烈”，以为“嵇兴高逸，阮旨闲旷”，但是，皎然接着又指出：“论其代，则渐浮侈矣。”可见，对于整个正始诗坛风尚，他是持否定态度的，以为此时已经渐染“浮侈”之气。按：钟嵘《诗品·序》认为，建安之后，“迄于有晋”，五言诗之发展，已入“陵迟衰微”之境；刘勰《文心雕龙·明诗》则批评说：“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钟嵘的意思，只是说正始五言诗总体成就不高，创作不够繁荣；刘勰则说以何晏为代表的正始作家，以“明道”为宗，偏于义理之阐发，诗味淡薄，诗意浅近。而皎然“浮侈”之议，似综合、发展了钟、刘两家的观点，在总体评价上吸收了钟嵘的看法，但更具体地指出了正始诗坛的弊端；同时，他又在借鉴刘勰“浮浅”之评的基础上，更侧重于正始诗歌语言形式特点的概括。

这里涉及李唐以前文风浮靡之源头的认定问题。这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唐代作家、文论家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比如，陈子昂《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称：“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咏叹。”^②在这里，“风骨”与“彩丽”是一组相对的概念，其意是说，自晋至宋，诗人创作没有很好地继承汉魏风骨，转而追求彩丽之美，此风至于齐梁，则变本加厉。显然，陈子昂批评“彩丽”诗风，是从“晋宋”开始的。卢藏用在《右拾遗陈子昂文集序》中虽然也提出“风雅之道扫地”的问题，但所论与陈子昂实有不同

① 《文心雕龙·明诗》评建安作家曰：“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这样的境界，是符合《风骨篇》所倡导的文风标准的：“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皎然说建安诗人“风裁爽朗”，显然也是借鉴了刘勰的看法。但他接着又说建安作家“终伤用气使才，违于天真”，则看到了“慷慨任气，磊落使才”所带来的弊端，比刘勰的观点又进了一层。

② 周祖谟编选：《隋唐五代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0页。

处。他说西汉司马相如、扬雄大赋作品中,就已经存在“溺于流辞而不顾”的弊病,东汉之后,直至晋代,“班、张、崔、蔡、曹、刘、潘、陆,随波而作,虽大雅不足,尚有典型。宋、齐之末,盖顛頫矣。逶迤陵颓,流靡忘返,至于徐、庾,天之将丧斯文也。后进之士若上官仪者继踵而生,于是风雅之道扫地尽矣”^①。从这里可以看出,卢藏用论“流靡”之风的源头,更追溯至西汉之扬、马,但对西晋作家潘岳、陆机,还是有所肯定。再如李白《古风五十九首》其一曾说“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又说“扬马激颓波,开流荡无垠”^②。他说“扬马激颓波”,与卢藏用同,说“绮丽”自“建安”来,则与陈、卢都不一致。皎然虽然不满于陈、卢的“道丧”之说,但他的诗史观,实际上跟陈、卢二家还是有一致处的。比如,他说:“晋世尤尚绮靡。古人云:‘采缁于正始,力柔于建安。’”这跟陈子昂所谓“汉魏风骨,晋宋莫传”,就有相通点。又如,他说“宋初文格,与晋相沿,更顛頫矣”,这跟卢藏用“宋、齐之末,盖顛頫矣”之论,不仅用词相类,价值判断也相距不远。由此看来,皎然的独特处,只在于他将“正始”时期视为“浮侈”诗风的滥觞。^③

皎然说正始年间“渐浮侈矣”,究竟有何体现?他并没有具体的描述。按:作为文论术语,“浮侈”一词,刘勰《文心雕龙》已用之,指的是华而无实的一种文风,如《章表》篇谓:“雅义以扇其风,清文以驰其丽,然恳恻者辞为心使,浮侈者情为文使。繁约得正,华实相胜,唇吻不滞,则中律矣。”^④卢藏用《陈子昂文集序》亦曾用之:“孔子歿

① 周祖谟编选:《隋唐五代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2—73页。皎然《酬薛员外道见戏》诗曰:“方知正始作,丽掩碧云诗。文彩盈怀袖,风规发咏思。”此又从文采、风规两个方面推崇“正始”之音。《全唐诗》卷八一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999页。

② 周祖谟编选:《隋唐五代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02页。

③ 与此相关的言论如《旧唐书》卷一九《杨炯传》:“尚书左丞(贾)至议曰:谨按,夏之政尚忠,殷之政尚敬,……厥后文章道弊,尚于浮侈,取士术异,苟济一时,自魏至隋仅四百载,三光分景,九州阻域,窃号僭位,德义不修。”《新唐书》卷四十四《选举志》:“魏晋以来,专尚浮侈,德义不修。”

④ 周祖谟编选:《隋唐五代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2页。

二百岁而骚人作，于是婉丽浮侈之法行焉。”^① 皎然也当是在这个意义上运用“浮侈”一词的，故下文有“晋世尤尚绮靡”之说。但是，就现有所能看到的正始诗歌作品而论，似乎都与“浮侈”无涉。所以，我们已无从知道皎然这一断语的依据何在，只能参考相关资料，得“浮侈”之仿佛。比如，史书中记载的有关正始时期世风之“浮侈”，魏曹芳当政时，即有此弊，《三国志·魏志》载太后废曹芳令，曰：“皇帝芳春秋已长，不亲万机，耽淫内宠，沉漫女德，日延倡优，纵其丑谑；迎六宫家人留止内房，毁人伦之叙，乱男女之节；恭孝日亏，悖傲滋甚，不可以承天绪，奉宗庙。”^② 裴注引《魏书》载群臣上疏太后请废曹芳曰：“皇帝即位，纂继洪业，春秋已长，未亲万机，耽淫内宠，沉漫女色，废捐讲学，弃辱儒士，日延小优郭怀、袁信等于建始芙蓉殿前裸袒游戏，使与保林、女尚等为乱，亲将后宫瞻观。又于广望观上，使怀、信等于观下作辽东妖妇，嬉褻过度，道路行人掩目，帝于观上以为燕笑。于陵云台曲中施帷，见九亲妇女，帝临宣曲观，呼怀、信使入帷共饮。怀、信等更饮酒，妇女皆醉，戏侮无别。”^③

曹芳在位的正始时期，因其年少，由大将军曹爽、太尉司马宣王辅政。其中曹爽就是一个胡作非为、纵恣无度的权臣，《三国志·魏志》卷九载：“爽饮食车服，拟于乘舆；尚方珍玩，充牣其家；妻妾盈后庭，又私取先帝才人七八人，及将吏、师工、鼓吹、良家子女三十三人，皆以为伎乐。诈作诏书，发才人五十七人送邺台，使先帝婕妤教习为伎。擅取太乐乐器，武库禁兵。作窟室，绮疏四周，数与晏等会其中，纵酒作乐。”^④ 曹爽既执政坛之牛耳，更援引浮华之徒，《三国志·魏志》卷九谓：“南阳何晏、邓颺、李胜、沛国丁谧、东平毕轨咸有声名，进趋于时，明帝以其浮华，皆抑黜之；及爽秉政，乃复进叙，任为腹心。”^⑤ 《魏志》卷二十八：“（诸葛诞）与夏侯玄、邓

① 梁肃《补阙李君前集序》：“盖道能兼气，气能兼辞，不当则文斯败矣。唐有天下几二百载，而文章三变。初则广汉陈子昂以风雅革浮侈。”

② 《三国志·魏志》卷四，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28页。

③ 同上书，第129页。

④ 同上书，第284—285页。

⑤ 同上书，第283页。

颺等相善，收名朝廷，京都翕然。言事者以诞、颺等修浮华，合虚誉，渐不可长。明帝恶之，免诞官。会帝崩，正始初，玄等并任职。复以诞为御史中丞尚书，出为扬州刺史，加昭武将军。”^①就此时社会风尚言，亦是如此，故夏侯玄曾提出，“今承百王之末，秦汉馀流，世俗弥文，宜大改之以易民望”，目的是使“朴素之教兴于本朝，则弥侈之心自消于下矣”^②。这种“弥侈之心”对当时诗歌创作有无直接影响，与皎然所论正始诗风“渐浮侈”有无直接关系，都是值得我们深长思之的。

如果我们将眼光从“诗风”扩展到“文风”，似应注意西晋范宁的言论。《晋书》本传载：“时以浮虚相扇，儒雅日替，宁以为其源始于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于桀纣，乃著论曰：……王何蔑弃典文，不遵礼度，游辞浮说，波荡后生，饰华言以翳实，骋繁文以惑世。搢绅之徒，翻然改辙，洙泗之风，缅焉将坠。遂令仁义幽沦，儒雅蒙尘，礼坏乐崩，中原倾覆。古之所谓言伪而辩、行僻而坚者，其斯人之徒欤！”^③范宁的立场是儒家的，所批评的对象是玄学家的论文，他指出，王、何之玄文，实为有晋浮侈之先声。这对我们理解皎然所谓正始之代“渐浮侈矣”，或许有一定的参考价值。^④

三 认识诗史的方法问题

在皎然的诗史观中，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内容，那就是明确的方法意识——既注意到某一时代诗风的总体倾向或弊端，又能充分地估量具体作家的艺术成就及其超越流俗的创作才能。也就是说，皎然很自觉地将“论代”与“论人”相对地分离开来，从而对前代诗歌发展及其历史贡献能够作出更恰当更辩证的评价。比如，当皎然从“论其代”的角度考

① 《三国志·魏志》，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769页。

② 同上书，第297—298页。

③ 《晋书》卷七十五，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984—1985页。

④ 明人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谓：“古诗降魏，虽加雄贍，温厚渐衰。阮公起建安后，独得遗响，第文多质少，词衍意狭。东、西京则不然，愈巧愈朴，愈潜愈深。”此处说阮籍诗“文多质少，词衍意狭”，跟皎然所谓正始诗风“渐浮侈”，在认识上，似有一致处。

虑问题时,就很明确地指出,正始“则渐浮侈”,“晋世尤尚绮靡”,“宋初文格,与晋相沿,更颀颀矣”。这种认识,实际上是唐代很多士人的共识。前面曾提到的陈子昂、卢藏用、李白,都是很典型的例子。盛唐著名诗人、诗论家王昌龄也是如此,其《诗格》中谓:“汉魏有曹植、刘桢,皆气高出于天纵,不傍经史,卓然为文。从此之后,递相祖述,经纶百代,识人虚薄,属文于花草,失其古焉。中有鲍照、谢康乐,纵逸相继,成败兼行。至晋、宋、齐、梁,皆悉颓毁。”^①王昌龄说自建安后,诗歌发展“递相祖述”、“皆悉颓毁”,这与皎然看法,显然是非常相似的。但是,王昌龄在论述诗史的过程中,却没有将“论代”与“论人”明确分开,连鲍照、谢灵运这样的作家,也一概否定掉了,并导致自相矛盾。所以,在具体评论中,王昌龄又说:“若谢康乐语,饱肚意多,皆得停泊,任意纵横。”^②这样的肯定性评价,与他对诗史的描述,就有抵牾之处。相比之下,皎然的诗论则周全严密得多,他在讲完“宋初文格,与晋相沿,更颀颀矣”之后,紧接着就转入“论人”:“论人,则康乐公秉独善之资,振颓靡之俗。沈建昌评:‘自灵均已来,一人而已。’此后,江宁侯温而朗,鲍参军丽而气多,《杂体》、《从军》,殆凌前古。恨其纵舍盘薄,体貌犹少。宣城公情致萧散,词泽意精,至于雅句殊章,往往惊绝。何水部虽谓格柔,而多清劲,或常态未剪,有逸对可嘉,风范波澜,去谢远矣。柳惲、王融、江总三子,江则理而清,王则清而丽,柳则雅而高。予知柳吴兴名屈于何,格居何上。中间诸子,时有片言只句,纵敌于古人,而体不足齿。或者随流,风雅泯绝。”^③此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充分认识到谢灵运所起到的“振颓靡之俗”的历史功绩,二是指出“随流”者之创作弊端。总而言之,是将诗坛宗匠与末流明确地分而论之。文学发展的历史,包括诗史,原本就是由超凡卓犖者与资质庸常者所共同构成的,偏重于任何一方,都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皎然将“论代”与“论人”结合起来,并明确地将二者区别开来,在方法论上是有重要启发意义的。这种方法意识,后来

① 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汇考》,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60页。按:“识人虚薄”之“识”,繁体作“識”,疑为“詩”之讹。

② 同上书,第164页。

③ 同上书,第203—204页。

直接影响到宋代严羽的《沧浪诗话》，故其概括历代诗歌体貌，有“以时论”和“以人论”的区别。

这种“论代”与“论人”并重的方法意识，也集中体现在皎然对南朝齐梁诗史的评述中，《诗式》卷四“齐梁诗”条曰：“夫五言之道，惟工惟精。论者虽欲降杀齐梁，未知其旨。若据时代言，道丧几之矣。诗人不用此论。何也？如谢吏部诗：‘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柳文畅诗：‘太液起沧波，长杨高树秋。’王元长诗：‘霜气下孟津，秋风度函谷。’亦何减于建安？若建安不用事，齐梁用事，以定优劣，亦请论之。如王筠诗：‘王生临广陌，潘子赴黄河。’庾肩吾诗：‘秦王观大海，魏帝逐飘风。’沈约诗：‘高楼切思妇，西园游上才。’格虽弱，气犹正。远比建安，可言体变，不可言道丧。”^①对于这样一段言论，论者往往只注意到皎然与陈子昂、卢藏用诗学观点的针对性，这是没有疑义的，因为陈、卢二人与皎然之间，在“诗道”内涵理解上，本来就不同：前者重风雅比兴之诗歌内容，后者重“惟工惟精”之诗歌境界。但是，还有两点有必要特别指出：一是对于陈、卢二人的诗道丧于齐梁说，皎然并没有全盘否定，而是以更周密的方式加以表述：“若据时代言，道丧几之矣。”^②这是就齐梁时期整个时代风气以及诗坛状况而言的，《诗议》中说：“中间诸子，时有片言只句，纵敌于古人，而体不足齿。或者随流，风雅泯绝。”又说：“齐、梁之后，正声寢微，人不逮古。”此外，《诗式》卷一“明四声”条指出：“沈休文酷裁八病，碎用四声，故风雅殆尽。后之才子，天机不高，为沈生弊法所媚，懵然随流，溺而不返。”这都可以用来说明皎然所谓齐梁之代“道丧几之”说的具体内涵。二是皎然的理论之所以比陈、卢二人更能全面反映齐梁诗史之事实，重要原因之一，则

① 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汇考》，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04—305页。

② 李壮鹰：《诗式校注》卷四，第3条注释：“时代：时序代迁。道丧：诗道丧亡。几：通讯，遽。‘矣’字疑为衍文。二句大意为：若操时变道丧之谈以贬责齐梁，诗人则不能同意此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75页。按：皎然所谓“时代”，就广义来理解，可以指时代政治之道；若就狭义来说，则是就齐梁时期诗歌创作的总体状况而言。至于“诗人不用此论”，已属于另一层面的问题，指具体的杰出诗人。